

宋磊  
著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tching-up Strategies

# 追 赶型工业战略的 比较政治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宋磊  
著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tching-up Strategies

# 追 赶型工业战略的 比较政治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赶型工业战略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宋磊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

ISBN 978-7-301-26958-9

I. ①追… II. ①宋… III. ①工业经济—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IV. ①F4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0321号

- 书 名** 追赶型工业战略的比较政治经济学  
ZHUIGANXING GONGYE ZHANLUE DE BIJIAO ZHENGZHIJINGJIXUE
- 著作责任者** 宋磊 著
- 责任编辑** 刘京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958-9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 电子信箱** [em@pup.cn](mailto:em@pup.cn) QQ:552063295
-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经管图书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73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5.75印张 215千字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48.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 目 录 | CONTENTS

## 第一篇 问题意识、理论框架、分析工具

第一章 问题意识 .....	003
第一节 研究领域 .....	003
第二节 问题意识 .....	011
第三节 篇章结构 .....	016
第二章 理论框架 .....	019
第一节 理论框架(1):作为交易的政策过程论 .....	019
第二节 理论框架(2):生产主义的工业战略观 .....	027
第三节 小结:能力构筑与租金转化 .....	044
第三章 分析工具 .....	046
第一节 分析工具(1):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寻租理论 .....	046
第二节 分析工具(2):基于产品建构的竞争力分析 .....	049
第三节 小结:政企关系的微观基础和关键因素 .....	061

## 第二篇 政策诱导租的分配与利益协调

<b>第四章 政策诱导租的分配(1):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b> .....	065
第一节 产业政策的所得分配效果和寻租活动 .....	066
第二节 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 .....	070
第三节 小结:发展型国家论的两个研究传统和寻租活动的两个 侧面 .....	077
<b>第五章 政策诱导租的分配(2):发展型国家的实践</b> .....	079
第一节 寻租成本的抑制机制 .....	080
第二节 日本的经验 .....	087
第三节 中国的教训 .....	099
第四节 小结:作为政企互动过程的租金分配 .....	110

## 第三篇 熊彼特租的实现与经济发展

<b>第六章 熊彼特租的实现(1):日本的实践</b> .....	113
第一节 日本产业政策的演变及其内在逻辑 .....	114
第二节 产业政策的早期典型:钢铁产业政策和造船产业政策 ..	119
第三节 产业政策的后续发展:广义的机械产业政策 .....	129
第四节 基于产品建构理论的产业政策评价 .....	150
<b>第七章 熊彼特租的实现(2):中国的调整</b> .....	173
第一节 在结构与理念之间:豪尔的政策范式论的内在逻辑 .....	175
第二节 非典型的政策范式变迁:中国汽车产业创新政策的 调整 .....	180
第三节 产品建构、组织建构、政府建构、经济理念与政策 范式变迁 .....	182

第四节 政策范式变迁、政府能力与租金转化效率 .....	193
------------------------------	-----

## 第四篇 扩展和总结

第八章 生产组织方式与追赶型工业战略研究 .....	199
第一节 生产组织方式:追赶型工业战略研究的潜在主题 .....	199
第二节 比较政治经济学和追赶型工业战略研究 .....	201
第三节 生产组织方式与租金转化效率 .....	203
第九章 东亚实践与追赶型工业战略理论的发展 .....	207
参考文献 .....	215

## 第一篇

# 问题意识、理论框架、分析工具

---

制度安排上的细微变动可能加速经济成长。但是实现长期成长所需的深入而广泛的制度改革却需要时间来实施并发挥作用。由于这些制度改革并不是直接针对经济体系中的最紧急的制约或机会,在短时间内,这些制度改革未必是提高产出的最有效的方法。同时,这些制度更容易在经济成长而不是经济停滞的过程中实施。成功的成长战略应该由两种努力构成:一种是启动成长(投资)的短期战略,另一种是维持成长的中长期(制度革新)战略。

丹尼·罗德里克(2003: 19)

通常的寻租模型只分析了寻租过程的一个侧面——寻租活动所消耗的社会资源。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寻租过程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结果,正是这种结果上的差异导致了寻租活动的纯效果的差异。

穆斯塔克·H. 汗(2000: 139)





# 第一章 | 问题意识

## 第一节 研究领域

### 一、产业政策实践和产业政策研究的兴衰

在经过长期的沉寂之后,产业政策重新进入政策制定者的视野,国内外学术界也再次密集地讨论这一充满争议的主题。<sup>①</sup>在政策领域,当今世界的三大经济体在2006年之后开始集体关注产业政策。在美国,时隔二十余年之后,奥巴马政府重提“美国制造”(made in America)<sup>②</sup>的理念,倡导“再工业化战略”;在中国,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自主创新”于2006年

---

<sup>①</sup> 关于产业政策,存在大量的定义。这些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定义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产业政策理解为在市场机制发生障碍的情况下,政府对特定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进行介入或对特定产业内部的竞争进行限制的政策(伊藤元重等,1988: 8)。另一种定义则从演化经济学的逻辑出发,将产业政策理解为所有有关产业发展的政策,认为产业政策具有制度工程学(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的特征(Cimoli *et al.*, 2007: 1—2)。笔者认为,第一种定义是为了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产业政策而做出的,实际上将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学术立场的政策实践排除在产业政策之外。具体而言,这种定义实际上将政府对于产业发展的介入限定在市场失败的前提之下。但是,正如本书的相关章节所提及的那样,产业政策不但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学现象。换言之,现实世界的政策实践并不一定以市场失败为前提。进一步地,对于特定产业而言,市场本身可能并不存在,政府必须担负创造市场的责任(Mazzucato, 2013)。因此,本书对于产业政策采取第二种定义。

<sup>②</sup> 关于美国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围绕“美国制造”问题的讨论,请参考Dertouzos *et al.* (1989)和Johnson *et al.* (1989)。

前后正式成为经济政策的主轴之一,“中国制造 2025”也成为当下的政策主题;在日本,广受争议的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实际上与产业振兴密不可分<sup>①</sup>。另外,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也对产业政策再次表现出兴趣(OECD, 2013)。

在国际学术界,赛默里、赖纳特和斯蒂格里茨等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家近年来再次集中地讨论产业政策问题(Cimoli *et al.*, 2007; 赖纳特, 2010; Stiglitz and Lin, 2013),我国学者贾根良、林毅夫等人也开始重新评估产业政策的必要性(贾根良, 2011, 2012; 林毅夫, 2014)。<sup>②</sup>在学理上,重新关注产业政策的学者主要有两类:一类采取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但是对长期指导后进国家发展的华盛顿共识持批判态度;另一类则依据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试图重构推动后进国家发展的政治经济逻辑。在我国,前一类学者的代表是林毅夫,后一类学者的代表是贾根良。如果说第一类学者更多的是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政策措施进行微调的话<sup>③</sup>,那么第二类学者则比较激进。由于与李斯特经济学具有直接的联系,后一类学者的研究逐渐汇聚为可以称为新李斯特主义的学术潮流。<sup>④</sup>

---

① 安倍经济学的另外两支箭分别是超级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和灵活的财政政策。

② 顾昕近年来在《读书》发表的多篇关于产业政策的评论(顾昕, 2013a, 2013b, 2013c)不但将这一研究领域的大量基础性文献介绍给国内学术界,而且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对于产业政策的关注。

③ 林毅夫认为,他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先进国家与后进国家存在结构性不同,后进国家的资本劳动比是动态变化的。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后进国家政府应该致力于改善基础设施、对先驱企业的探索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性进行补偿(林毅夫, 2014: 16, 19—20)。在产业政策方面,林毅夫认为,后进国家应该发展和本国具有类似的资源禀赋、人均收入稍高于本国的国家所成功地发展的产业(林毅夫, 2014: 194—198)。就上述内容而言,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措施与主流经济学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源于新结构经济学对于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过程或动态比较优势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林毅夫的早期研究(林毅夫等, 1994)相比较,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下,企业自生能力(林毅夫、刘培林, 2001)占有关键地位,而决定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的是企业所进行的经济活动是否基本符合后进国家的动态比较优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结构经济学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政策措施的微调。

④ 新李斯特学派视野宽广,所讨论的问题超越了旧李斯特学派的范围,涉及了国内制度改革等问题,但是政府介入或产业政策仍然是其中心议题。关于中国学者倡导的新李斯特学派,可以参考《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和《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3期的相关专题。

面对上述变化,熟悉产业政策实践和产业政策研究史的学者大概难免会有河西河东之叹。发端于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实践和滥觞于以日本政府的介入为早期素材的发展型国家论的产业政策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前期都曾经盛极一时(约翰逊,2010; Amsden,1989; Wade, 1990; Chang, 1994; Evans, 1995)。但是,在 90 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政府对于产业发展的介入所隐含的负面因素逐渐被认识,发展型国家似乎开始衰退(朱天飏,2005),发展型国家论也风光不再。

在产业政策重回聚光灯之下的今天,提及产业政策实践和产业政策研究的兴衰起伏的用意当然不是简单地否定进行中的产业政策实践和正在复兴的产业政策研究。但是,回顾产业政策在世界各国的复杂实践和产业政策研究中的长期争论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在世界各国的产业政策实践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长期的产业政策研究之中,若干重大的理论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因此,如果无法客观地把握世界各国的政策实践并从理论上厘清一些关键问题,那么新一轮产业政策热潮未必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对于美日而言,新一轮产业政策的成败所涉及的是本来已经非常强劲的企业竞争力能否得到持续提升的问题。但是,对于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竞争力升级的关键期的中国而言,新一轮产业政策的成败或许将影响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 二、开拓型产业政策对追赶型产业政策:关于研究领域的界定(1)

产业政策是一个宽泛的研究主题。对于产业政策的类型的把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

如表 1-1 所示,从政府介入的方向和政府介入的性质两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把产业政策区分为四种类型。发展型国家论的早期理论家曾经

将美国和日本归纳为规制型国家和发展型国家(约翰逊, 2010)。<sup>①②</sup> 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介入的强度不同, 但是所谓规制型国家和发展型国家实际上在全部四个领域都进行介入。比如,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 无论规制型国家还是发展型国家都在表 1-1 中(b)、(d)两个领域进行了介入, 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和陷入衰退的产业(企业)进行救助。另外, 在表 1-1 中(a)领域维持竞争秩序, 即制定反垄断法也是规制型国家和发展型国家常见的政策现象。<sup>③</sup> 在上述意义上来说, 简单的两分法难以体现政企关系的特征。实际上, 发展型国家论的早期理论家所讨论的规制型国家和发展型国家的区别主要存在于表 1-1 中(c)领域。

表 1-1 产业政策的类型学(1): 介入的方向和性质

		介入的方向	
		横向的(功能性的)	纵向的(战略性的)
介入的性质	主动	典型政策: 维持竞争秩序的政策 (a)	典型政策: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 (c)
	被动	典型政策: 修复或改变竞争秩序的政策 (b)	典型政策: 衰退产业援助政策 (d)

资料来源: 根据宋磊(2013: 233)改写。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学术界倾向于将美日两国政府在表 1-1 中(c)领域的区别理解为美国政府很少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 而日本政府则积极地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行产业政策。然而, 近期的研究表明, 这种认识没有反映美国政企关系的本质。实际上, 美国政府同样在表 1-1

①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 所谓规制型国家和发展型国家并非全然对立, 美国与日本都存在规制型国家和发展型国家的要素。因此, 这样的分类并不清晰。

② 一般来说, 英国的经济体制被认为接近美国。但是英国也推行产业政策( Coates, 1996)。

③ 关于表 1-1 中(a)、(b)、(d)领域中的政府介入, 参见韦登鲍姆(2006)。

中(c)领域内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比如,美国政府不但对于半导体、制药、纳米技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且影响了这些产业的商业模式,被认为代表了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的苹果公司的兴起也和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的介入密切相关(Mazzucato, 2013)。<sup>①</sup>

在笔者看来,将战略性产业区分为成熟产业和新兴产业有助于我们理解美日产业政策的本质区别。成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特征可以借助厄特拜克关于创新的经典定义来理解。厄特拜克认为,不同于进行发明或试制样品,所谓创新是技术的实际采用或首次应用(Utterback, 1974: 621)。<sup>②</sup>依据这一定义,所谓成熟产业指已经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发展的产业,而所谓新兴产业指尚未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充分发展的产业。

借助上述区分,我们可以发现,在获得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之后,尽管美国政府也针对成熟产业制定产业政策,但是,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的重点在于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产业政策的重点是开拓型产业政策。相对地,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国际技术前沿之后,日本政府也开始重视新兴产业,但是在从战后恢复到90年代初期,日本产业政策的重点主要指向成熟产业。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在90年代初期之前,日本产业政策的重点是追赶型产业政策。进而言之,尽管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在推动开拓型产业政策,但是与90年代之前的日本一样,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的主体是针对成熟产业的政策,即追赶型产业政策。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即推行本书所说的开拓型产业政策当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成熟产业之中实现赶超,即执行本书所说的追赶型产业政策显然是更为现实的问题。与上述认识相关,笔者将本书的研究对象限定在表1-2中的(b)领域,主要对日本和中国的追赶

---

<sup>①</sup> 将后进国家和先进国家的产业政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意义。受篇幅限制,本书集中讨论后进国家的产业政策问题。关于美国产业政策,特别是美国的开拓型产业政策的详细讨论,参见Block(2008)、Lazonick(2012)和Mazzucato(2013)。

<sup>②</sup> 弗里曼和苏特也有类似的定义。在他们看来,创新指在经济中采用和推广经过改进的产品和工艺(弗里曼、苏特,2004: 4)。

型产业政策进行比较分析。<sup>①</sup>

表 1-2 产业政策的类型学(2):目标产业和介入的主体

		目标产业	
		成熟产业	新兴产业
介入的主体	发达国家	典型政策:美国的“制造业回归”战略;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 (a)	开拓型产业政策类型一 典型政策:美国的高科技产业政策;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的高科技产业政策 (c)
	发展中国家	典型政策:高度成长期的日本的产业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成熟产业的中国产业政策 (b)	开拓型产业政策类型二 典型政策:21世纪的中国高科技产业政策 (d)

### 三、日本的追赶型产业政策对中国的追赶型产业政策:关于研究领域的界定(2)

本书酝酿于20世纪90年代末产业政策研究的低潮期,完成于21世纪产业政策的重新兴起期。写作时间的跨度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笔者观察产业政策的一个视角,即重视时间维度的影响。借用惠特克的用语,时间维度具有时间(time)和时机(timing)两层含义。这里所说的时间是一种历史演进的刻画尺度,而所谓时机则指历史演进中的关键时刻(Whittaker *et al.*, 2015)。中日两国的追赶型产业政策是20世纪后半期之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政策领域的两次典型尝试。如果说这种时间上的连续性意味

<sup>①</sup> 关于追赶型产业政策和开拓型产业政策的区别,可以从两种政策所处理的不确定性问题的性质来理解。在理论上,两种政策都需要处理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问题。由于具有参照系,所以追赶型产业政策所处理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是结构化的不确定性,问题的本质是如何创造性地模仿先进国家政府和企业的实践。但是,由于缺乏参照系,开拓型产业政策所处理的不确定性是纳特意义上的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

着两国的产业政策具有可比性的话,那么,两国的追赶型产业政策启动时期的差异则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两者的差异,是关于两国追赶型产业政策的比较分析的重点。<sup>①</sup>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世界经济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变化当属东亚经济体的连续崛起。在这种崛起过程之中,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日本的发展和80年代之后中国的发展都具有关键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中日两国的发展过程中,追赶型产业政策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日两国的追赶型产业政策是发展中大国面对同样问题所做出的类似回应。<sup>②</sup>但是,对于本书而言,时间维度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

中日两国的追赶型产业政策出现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国际技术-生产体制之下,而后者对于前者的性质和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换言之,中日两国的追赶型产业政策具有不同的形成时机,而这种时机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两国追赶型产业政策的应然形态。一些学者指出了时代背景对于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的影响。在这些学者之中,有的重视主流经济意识形态的变迁(高柏,2006),有的强调发展模式的变化(Whittaker, *et al.*, 2010)。本书试图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发展能够更为细致、准确、全面地反映中日两国追赶型工业战略的异同的理论视角。

#### 四、产业政策对工业战略:关于研究领域的界定(3)

本书的主体部分同时使用工业战略和产业政策两个术语。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与笔者对于产业政策的政策主体和产业政策的政策过程的本质的理解有关。

一般而言,产业政策往往被视为一个主要由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过程。在这种视角之下,政府是唯一的政策主体。同时,尽管这种视角强调

---

<sup>①</sup> 无疑,两国的国内制度环境存在明显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当然是关于两国产业政策的比较分析的组成部分。但是,这样的视角显然过于直观。本书试图从这些显而易见的视角出发,构筑更为广阔的分析框架。

<sup>②</sup> 严格地说,在英国(或英国和法国)之后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家都曾经是或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建国初期的美国和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日本都曾经是发展中国家。

政府和企业的互动,但是这种互动实际上被认为主要发生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之中。

在产业政策的政策主体和产业政策的政策过程的本质两个问题上,本书分别倡导双主体说和两阶段说。所谓双主体说指政府和企业共同构成产业政策的政策主体,而所谓两阶段说指产业政策的政策过程由政府配置政策资源的阶段和企业运用政策资源的阶段组成。很明显,双主体说和两阶段说具有亲和性。<sup>①②</sup>

在双主体说和两阶段说的视角之下,产业政策的政策过程具有分别由政府和企业主导的两个阶段。由于关于产业政策的现有研究基本上排除了企业主导的阶段,所以,在笔者看来,已经约定俗成的产业政策一词无法完整而准确地表现产业政策的政策过程,本书采用工业战略——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和企业主导的企业战略的综合体——的原因即在于此。

总的来说,本书试图从政府主导的政策资源配置和企业控制的政策资源运用两个角度出发,在构筑一个关于产业层面的政企互动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日本和中国的追赶型工业战略进行比较分析。对产业政策的政策主体和政策过程的本质的认识方式决定了本书将同时采用政治经济学<sup>③</sup>和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对主要由政府主导的政策资源分配过程的重视,意味着本书的分析方法是政治经济学的;对主要由企业控制的政策资源的运用过程的强调,意味着本书的分析方法含有管理学的成分。在

---

① 如下文所述,冈泽宏(1984)认为企业参与了政策制定过程,所以产业政策研究应该将企业纳入分析框架。这种认识可以称为双主体说的早期形态。笔者倡导的双主体说与冈泽宏的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同时关注政府和企业,区别则在于笔者将企业运用政策资源的过程视为产业政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② 正如本书第一篇的题记所表明的那样,罗德里克注意到产业政策的阶段性问题。尽管他主要是从政府如何进行制度建设的角度指出成长战略或产业政策应该被视为一个由两阶段的努力构成的过程,并没有直接将第二阶段的实质理解为企业通过生产活动将政府提供的资源转化为企业能力或竞争力,但是这一认识对于笔者倡导的两阶段说具有重要的启发。

③ 在中国学术界,政治经济学往往指作为理论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是,在国际学术界,除作为理论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政治经济学也指关于政企互动和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朱天飏,2006)。本书在上述两个意义上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



笔者的阅读范围之内,本领域的先行研究尚未明确地提出这样的研究方法。本书第二章的第二节将详细讨论这一问题。

## 第二节 问题意识

本书的研究问题源于两个相互关联的、与上文提出的产业政策的双主体说和两阶段说相对应的问题意识。

第一个问题意识与政府介入的所得分配效果有关。政府在产业层面的介入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现象。由于后进国家一般面临资金紧缺的约束条件,所以政府对于资源配置的介入的本质是将有限资源导向特定的产业或企业。很明显,在资金紧缺的背景下,这种介入具有所得分配效果。因此,这种介入必然在直接和间接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引发矛盾。<sup>①</sup>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产业政策的早期研究者之一小宫隆太郎所指出的那样,在后进国家,政府支持的产业或企业所获得的资源实际上是另外的产业或企业的负担(小宫隆太郎,1975: 321)。如果政府介入以保护特定产业的形式出现,那么不同产业的收益也将有所不同(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9: 215)。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出现围绕政府介入的“公正问题”。产业界和社会、产业界和消费者、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企业从业员与股东(小宫隆太郎,1975: 324—327)、资本家与劳动者、作为资金提供者的家庭和作为资金使用者的企业之间的矛盾(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9: 216, 217, 229)即是这种问题的典型反映。<sup>②</sup>

理论上,上述矛盾大多围绕政策资源展开。在很多场合,这些矛盾以寻租成本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这种矛盾不能被有效地化解、这种寻租成本不能被有效地抑制,那么政府介入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在一些情况下,政

---

<sup>①</sup> 在原则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上述逻辑当然都是成立的。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源尤为紧缺,所以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sup>②</sup> 高柏曾经在讨论后进国家的生产主义倾向的时候提及生产者 and 消费者之间的矛盾(高柏,2008: 35—36)。但是,他并没有涉及产业政策的所得分配效果。